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二十一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景梅九的传奇人生

雒春普
著

景梅九是一个坚定革命者——作为早期的同盟会员，他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中，无论是组织发动、舆论宣传，还是辛亥举义、反袁护法，都义无反顾；他是闻名于世的一代报人、知识广博的学问家；他的红学著作《石头记真谛》是公认的索引派代表作。景梅九一生极富传奇色彩。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21辑)

景梅九的传奇人生

雒春普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5 字数:300千字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434-33-x

G·73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领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杨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士星	郭双威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家世与求学	(1)
二、在革命的洪流中	(4)
三、回晋“给大家定主意”	(11)
四、为保卫“共和”而战	(17)
五、一代报人的正义呐喊	(23)
六、无政府主义、相对论、世界语	(32)
七、“红学”著作《石头记真谛》	(37)
八、“恃强犹觉是青春”	(45)

引 子

景梅九，本名定成，字梅九，以字行，别号无碍居士。景梅九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作为早期的同盟会员，他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中，无论是组织发动、舆论宣传、军事策划，还是辛亥举义、反袁护法，都义无反顾。景梅九同时还是闻名于世的一代报人、知识广博的学问家。作为报人，在1904年到1949年的45年时间里，他参与创办过的报刊达二十多种。作为学问家，他精通日语、英语、俄语、世界语等语种；他在诸子百家、周易、音韵学、书法、语言文字诸多领域都有不俗的造诣；他的著述涉猎治“易”、考“红”、历史、语言、译介等等。他的红学著作《石头记真谛》是公认的索引派代表作。中国最早接受相对论的直接渠道是日本物理学家石原纯，而石原纯关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许多文章也是由景梅九所译介的。显而易见，景梅九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

一、家世与求学

1882年3月15日（清光绪八年农历正月二十六），景梅九出生于山西安邑（今属运城市盐湖区）城内北街泊池岸五号。祖父系晚清秀才，耕读传家。父亲景丹祺，字吉甫，号条

麓，师从芮城县薛仁斋。凭借着家学渊源，景丹祺学有所成，“长于宋理学，收集程、朱遗书甚丰，尤长于天文、算术、地理，著有《天元算学》。”景丹祺后来亦考取秀才（加上景梅九，景家三代秀才），以教书终其一生，足迹遍布安邑、猗氏一带。

景梅九自幼聪慧，酷爱诗文。3岁（1885年）时就开始跟其叔祖（叔祖有文化，懂阴阳风水）学识字；4岁（1886年）已识得五千多字；6岁（1888年）涉猎天干地支等知识，并学《三字经》及《诗经》等；同年入私塾，受业于同邑景汉卿先生；7岁（1889年）即帮助叔祖出外从事看风水、合婚等活动；10岁（1892年）通五经；11岁（1893年）考中秀才。

其时山西各地流行早婚。时尚使然，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14岁的景梅九在长辈的主持下完婚，娶的是安邑东街的李家之女，新妇长丈夫4岁。1897年，长子出生，15岁的景梅九未成年就做了父亲。两年以后再添一女。李氏夫人1906年病逝，续娶解州城内阎氏之女阎立青。

1899年，这一年，17岁的景梅九以优异的成绩被选入山西最高学府太原令德堂——1882年（清光绪八年），时任山西巡抚张之洞，针对山西“士气衰微而废其学”、“此时唯若人才不足”的情况，提议设令德堂于明代晋藩宝贤堂旧址。在令德堂，修朱子学说、《近思录》等，同时对算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并期间，常听人传颂傅山傅青主逸事，于是对傅山先生渐生仰慕之情。

这时的景梅九可谓少年气盛，恃才傲物。只因一次算学作业被令德堂山长屠梅村写了“作算不能胡说”的批语，即

负气离校。退学后“说帐”做了家庭教师，一度以教家馆维生。教学之暇，遍览史传，尤喜读《后汉书》。退学与教家馆给景梅九带来的一个最大的转变是决心“不再追求仕进”。为此，他自题座右铭，称：“丈夫自有事，奚暇共庸夫俗子，争逐功名富贵哉！”

在1900年的庚子之变中，景梅九目睹了太原街头义和团烧教堂、杀洋人的举动，表示“恨教民欺负平民，心里却有些痛快。”是年冬，景梅九弃教从学，入晋阳书院（晋阳书院的前身是创办于明万历年间的“三立书院”，1733年正式改名“晋阳书院”）继续学业。由于山长谷如墉提倡古文辞，加之“不再追求仕进”，故而丢开八股文，潜心钻研史籍，受益匪浅。日常与朋友谈诗论文、说古道今，接触到清兵入关残杀汉民，遍设文字狱迫害士人，镇压各地反清起义的历史故事，心里埋下了“报复”的火种。

1901年秋，太原的乡试科场移至西安，同学纷纷前往应试，独景梅九不为所动。当有人说：“照你这样，原来薄举人而不为”时，他笑着回答说：“岂但举人？我还是薄天子而不为的哩！”志向高远溢于言表。也就在这一年，辛丑条约签订。此后，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景梅九在求学道路上实现了“三级跳”。

1902年春，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用山西的庚子赔款在令德堂和晋阳书院的基础上，创办山西大学堂，原令德堂、晋阳书院转为中斋，增设西斋。谷如墉成为山西大学堂的创办人之一，依例景梅九由晋阳书院转入新立之山西大学堂中斋。

山西大学堂正式宣告成立于1902年5月。是年暑期结束后,山西大学堂保送5名学生到京师大学堂,这大概就是早期的校际交流。景梅九荣幸地成为5名保送生之一,入京师大学堂,进师范馆学习。在京师大学堂学习的一年左右时间里,景梅九在涉猎诸子百家的同时,开始接触西学精粹,从而萌发了“想要做第一流学者”的念头。假如不是后来的出洋留学,假如没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背景,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埋头书斋的景梅九完全可以成就为一个纯粹的学者,一个“第一流的学者”。然而毕竟“假如”仅仅是“假如”,后来发生的一切改变了景梅九的道路。

就在景梅九潜心向学,向“第一流学者”努力的时候,清廷鉴于屡屡挨打的教训,开始逐年增加公派留学生。1903年,景梅九考取官费留学生赴日本深造。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本乡第一高等学校,先入理化科,后改学法科,获法学博士学位。1907年,学成归国。

这样,景梅九从山西大学堂到京师大学堂,再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在三所高等学府里完成了他的大学教育,由清末秀才成长为“法学博士”。

二、在革命的洪流中

出洋留学给景梅九开启了一扇通向近代世界的窗户,同时也改变了他旧有的成长轨迹。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景梅九迅速成长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

主义者。

在近代山西乃至近代中国景梅九称得上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据《景梅九评传》介绍，他的故乡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景家在安邑城内北街的老屋紧邻一座池泊，池泊的不远处有一尊十三级唐塔和一座牌坊。人们说池泊就像一块硕大的砚墨池，高耸入云的唐塔则是一管冲天而上的巨笔，雕梁飞檐的牌坊俨然就是放笔的笔架。禹都圣地，地灵人杰，又有此奇景，后世必定还要再出才子名人。到了近代，果真出了一位，就是景梅九。这固然是附会之说，但是幼时的景梅九确实是超凡脱俗，11岁中秀才就是最好的证明。后来的景梅九也确实是名闻遐迩，当然这首先源于他的革命生涯。

景梅九少年时就志向高远，14岁时曾自撰一副对联：“岂有文章惊海内，拟将足迹遍瀛寰。”在太原求学期间，他“颇留心史传，最好读《后汉书》”，课余“常和朋友谈论诗文”。这时他接触了《明末遗史》、《扬州十日记》等史籍。随着视野的开阔，反清情绪逐渐滋生。庚子之变则使景梅九这一代人进一步看到了清廷的黑暗和腐败。是时，他虽然尚不晓得“种族革命”，但“心底”里已埋伏下“报复”二字。入京师大学堂后，随着视野的拓展，景梅九更认识到清廷已是“洋人的朝廷”，“复仇”之心终于萌生出革命意识，向往“海外革命中心”日本。于是，抓住官派留学生之机，“积极应考”。

负笈东瀛使景梅九得以亲历革命浪潮的洗礼。一迈出国门，景梅九就与同辈学子一样，被一种新的气氛所感染。景梅九留学日本的四年，正值同盟会的酝酿和创建期，中国

留学生荟萃的东京，则恰好又是当时革命的组织宣传中心之所在。1904年前后，受到清廷迫害的革命派人士——包括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兴复会、兴中会等革命组织的骨干分子和立志求学救国的爱国青年先后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鼓吹民主革命的书刊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宣传爱国主义的讲演随处可见。甫至日本，景梅九就接触了《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革命者的代表作。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景梅九感到“种族革命”“甚合心理”。于是，在与革命者关系逐渐密切的同时，即开始参与他们的活动。1904年，秋瑾创办《白话报》，景梅九参与其事。同年，山西留日学生组织“山西留学生同乡会”，景梅九被推选为会长。

1905年8月，“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中国同盟会，景定成因回国探亲，未及参加，然已受种族革命思想影响，在太原各校讲演宣传。”在家乡，景梅九同李岐山等旧友广泛联系，热情地介绍海外形势和革命思潮，并进而立下“振兴中华，进行社会革命”的誓约。与此同时，积极倡导禁烟、放足，成立天足会，并在运城和好友李岐山等创办“回澜公司”，专售戒烟药丸。回澜公司一方面做禁烟工作，一方面联系志同道合者，后来更成为秘密活动之革命机关。返回东京后，景梅九得知有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之成立，山西留日学生已有多人加入，遂于1906年3月由谷思慎介绍入会，并任同盟会山西分会评议部长。此后，景梅九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由学富五车的秀才逐渐转变成成为热情奔放的革命者。

从加入同盟会至1907年东京帝国大学第一高等学校

毕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景梅九主要致力于革命的宣传发动——1906年1月，黄兴、陈汉园等主办《汉帜》，他在其中担任译述；随即，他又与王用宾共同创办《晋学报》，后改为《晋阳白话报》，向国内发行；《晋阳白话报》被查禁后，又创办《第一晋话报》、《晋乘》等，以抨击满清朝廷，进行革命宣传。

1905年，适逢英商福公司和前清总理衙门定约，专办山西平（定）、孟（县）、潞（安）、泽（州）各处矿产，以60年为限。那年盛宣怀在外务部，又同福公司续订采矿条约，把山西矿权一齐送给外人。面对清廷出卖山西矿权的行径，“内地绅商”“一面上书向政府力争，一面与山西留东学生一封急信。”上述背景下，为反对英国福公司掠夺山西铁矿及炼铁之权，争回矿权，山西爆发了一场轰动海内外的群众性争矿运动。

消息传到日本，广大留学生的爱国爱乡之情空前高涨。景梅九遂以山西同乡会长身份，在山西留日学生中发起组织了一系列的声援活动。首先在东京神田江户亭召开山西留学生大会，由同盟会员王用宾作了争回矿权的演讲，大造争矿舆论。接着，“派代表王用宾和梁善济等回国交涉，并发表《留东学界通告内地废约自办公启》，提出争矿的两种办法。一为合起全体之争，即联东瀛学界十余省爱国人士，援粤汉铁路成例，合全力以与福公司争；一为离开合同之争，指出‘此合同显系欺诈’”。景梅九自己则“因为晋矿事，曾作了一个时评，登入《民报》……。后来在第一晋话报上边，用全力攻击盛宣怀、梁敦彦等”，以“激起一般人主权思想”。

“正当争矿运动掀起高潮之时，在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班学习的阳高县学生李培仁于1906年农历八月二十六日蹈海自杀，激起留日学生的极大愤慨。”利用这一契机，山西同乡会责成王用宾借李之名，援笔写成《李培仁蹈海绝命书》，详叙争矿理由和殉矿决心，宣称：“矿权失，而晋人生命绝。”绝命书的公布使声援活动掀起了一个更大的高潮。在东京，“留学生看了这一封书的，莫不心伤气涌。于是景梅九和同人商量，先设起同乡追悼会，由景太昭（耀月）作了篇骚体祭文，哀音满纸，闻者泣下！其余也有作挽诗的，作挽联的，皆能说出死者的心事。当时豫晋秦陇四省协会才组织起来，也发起一个大追悼会，轰动了全留学界”。之后，景梅九等被推举为代表，护送李培仁遗体回国，在太原召开追悼李培仁烈士大会，广为散发《李培仁烈士蹈海绝命书》。在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合力推动下，1908年（光绪三十三年）1月在北京签订了《赎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争矿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同盟会成立后，即在各地建立支部和分会。山西分会受国内北部支部（设在烟台）领导，会址设在东京。同盟会山西分会成立后，首要的工作就是发展组织。经过宣传鼓动，在东京的山西留学生纷纷入会，“两年内单在日本入会且有据可查的即有50多人。山西留日学生这样成批入会，在北方是各省之冠。”景梅九后来回忆说：“同盟会原来发起于南方同志，西北方面除张溥泉（继）外，最初加入的，还算山西人占了多数。”这时的景梅九已是山西籍同盟会员中的活跃分子，他在东京自己的寓所挂起“明明社”牌子，作为秘密联络

革命同志之处所。

加入同盟会后，景梅九开始注意研究军事问题。他选学的专业就是理文科，打算作理学博士。他和一位四川同志商定，一个学火药专门，一个学工科造兵器专门，以适应尔后军事斗争的需要。他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认识到革命军只在南方起义，而北方无一省回应，故清军可用北方财力兵力扑灭革命。因此他主张将来的国民革命，首先在南方发起，但也要在“南响北应”上下功夫，尤其要注意做好北方工作，以便准备南北“共举革命军”。他在述及这个问题时说：“我常和同志谭（谈）太平天国遗事，说当年失败的原因，固然在于意见不齐；病根由于诸人权利心重，责任心轻，这是中山先生说过的中肯话。我以为洪杨倡义南方，虽说据了天下一半，北方到底没有一省响应，所以清政府能够缓缓地用北方财力，兵力，去平灭他。我们今日第一要事，就是专从南响北应下功夫；极而言之北响南应亦无不可；同人颇以为然。”

景梅九所说的“南响北应”就是：“同盟会因为种种关系，把革命任务分开了江南江北两部分。中山先生与同志们研究发动起义的地点，大家都主张在江南。因为一方面江南离北京远，发动起来，北方的清军不容易集中反击，一方面江南有海口，易于输入军需品及得到外力的援助，且江南的革命潮亦较江北为高。因此江南江北所负的任务就不同了。当时决定山西所负的任务是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出兵石家庄，接援革命军北上。”也就是在积极准备革命军从南方举义时，“从山西陕西下手，出来一支奇兵，出井陘截取京汉

铁路的中心，一支兵出函谷关直据洛阳，与南师握手中原”。景梅九“南响北应”的战略设想，为同盟会革命总方略的确定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意见。

1907年，景梅九完成在日本的学业，“回国急速运动社会革命”。回国之初，景梅九到青岛，和商震等人筹办震旦公学。在青岛期间，因“提倡罢工为救急的办法”，在船厂工人中间发动同盟罢工而被“驱逐”离境，不得不前往北京。到北京后，景梅九与陕西革命党人井勿幕相携回太原。在太原与山西的革命党人会合，共同讨论制定了山陕两省及西北地区的革命计划。景梅九认为，山西表里河山，京师侧翼，进可出中原，威逼北京；退可防守，节节设防。陕西是西北、华北、江南的连接地带，地形险峻，且陕西民性强悍，哥老会活动比较普遍，有一定势力，又有李自成起义的反清传统，可以做西北革命的根据地。秦晋两省联合发动起义，相互策应，革命目标不难达到。以此为出发点，秦晋两省联合发动起义的方略形成。随即，井勿幕返陕运动，景梅九则回到运城安邑做起义准备。在家乡，他创立教育会，出任会长，并以此为掩护发展革命组织，介绍一批热血青年入会。后来成为河东革命中坚的李岐山、郭朗清等就是其时由他介绍加入同盟会的。

历史进入1911年，辛亥革命的浪潮扑面而来。1911年2月10日，景梅九在北京与王用宾等合力创办《国风日报》，充当同盟会在北京的主要喉舌。《国风日报》一经创刊即以战斗的姿态抨击腐败政治，揭露贪官污吏。在此之前的1910年春，山西巡抚丁宝铨一手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文交惨案”。

山西的革命党人以此为契机展开“拔丁”运动。《国风日报》创刊后，即与汉口的《中西日报》、上海的《申报》、太原的《晋阳公报》遥相呼应，联手反丁。一篇《东西两抚罪状》的文章，把丁宝铨为保全自己不惜残民以逞的面目揭示得淋漓尽致。正是《国风日报》的一把火，最终把丁宝铨赶出山西——1911年6月28日（宣统三年五月二十二），清廷上谕“山西巡抚丁宝铨因病奏准开缺”。“晋省人心大快，时人称梅九雅号‘拔丁’。”《国风日报》因其鲜明的革命性和无以伦比的影响力，而深得时人青睐，是故有“东京的《民报》和北京的《国风日报》可抵十万大军”之说。

三、回晋“给大家定主意”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城头树起了义旗。10月29日太原光复，阎锡山被推举为山西都督。太原光复的消息景梅九是在北京得知的。太原一经光复，都督阎锡山即派忻县同志李成林携密函赶赴北京，邀景梅九回晋襄助革命。于是，他从北京起程回山西。他后来在《罪案》中专门提到这一件事时说：“我何以定要回山西呢？一来因为山西南北同志，和我都有密约，我不回去，怕大家不接头，且生怨望；二来外省同志，也算我交识较广些，我不回去，怕大家有些隔膜的毛病，便不好共事；三来若得机会，还想把社会革命，同时干起来，所以早下了一番决心，要回去。且预定的计划，是山西最后再影响，不防备爆发的太快了，所以他们有

密信来，也教我快点回晋，好给大家定主意。”

景梅九与姚太素、江汇川一行三人，由北京乘火车，绕道平山辗转回到太原。其时，吴禄贞已受命率清军第六镇攻晋。吴禄贞乃革命同志，湖北云梦人。武昌起义后，即与冀东滦州之第二十镇统制，以及驻奉天之第三镇第二协统领蓝天蔚等商定，以张、蓝所部南下，吴部北上，夹击北京。受命攻晋率部至石家庄后，吴禄贞又特派参谋何遂等与山西民军联系，商讨联合进军北京之事。

景梅九一行的到来，给因对外界情况缺乏了解，在与吴禄贞合作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的阎锡山以及山西军政府吃了一颗定心丸。景梅九在后来的回忆中这样说：“我到了太原，先见了润轩，他已经办起了《山西民报》，标着中华民国年号。高兴极了！然后钱甫（杨彭龄）一直领我到咨议局——都督府，见了阎伯川（锡山）、黄绍斋（国梁）诸友，皆在座。非常喜欢！……他们问外边情形，我说了个大概，伯川主张教我在议场报告，以释群疑；并坚同志的心。于是召集都督府人员，议长议员等参与其中的很多。大家坐定，我便登坛报告，说：‘我出京时节，南方各省独立者纷纷，清廷无力兼顾。吴统领是革命同志，决不打山西！我可以去见他，协议一切。此次革命成功，可操左券……云云。’大家听了，仿佛以为可信，面带些喜色。伯川对我说：‘清廷命吴绶卿为山西巡抚，怕他贪图此位，变了卦？’我说：‘绝不至如此，革命成功，他的位置，何止一巡抚！’伯川首肯说：‘你可同着仇亮君，再到石家庄去一遭！’我说：‘好，事不宜迟，我立刻便去！’”

随即，景梅九衔命出发，连夜赶到娘子关山西民军前敌

总司令部商量实施办法。虽甫至娘子关即得到吴禄贞遇难的噩耗，仍不顾一切前往石家庄，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景梅九一行于11月7日上午到达石家庄，在车站看到臂缠白布的起义士兵，并先后遇到何遂和第六镇第十二协协统吴鸿昌。双方会商善后，议定：向张绍曾发电，邀张由奉天发兵直攻北京，第六镇负责声援；派兵截断石家庄南北铁路，以防清兵南下，解武昌革命军之围；将吴禄贞截留的清廷由德国购进运往汉口的枪炮、弹药移存娘子关；吴鸿昌集合第六镇所部，景梅九、仇亮集合在石家庄的山西民军，为吴禄贞致哀，誓师北伐。议毕，景梅九与仇亮在车站集合起晋军，将吴禄贞等三人的遗体买棺装殓，浮厝于车站之旁。可是一直等不来吴鸿昌及其所部。在吴鸿昌置前约于不顾，集合六镇兵向正定方向退走的情况下，景梅九以山西民军为主力，又动员当地老百姓，把几百箱枪炮弹药搬上火车，连夜运回娘子关。

燕晋联军功败垂成，景梅九认为事已至此，阎锡山有必要以山西都督的名义致函武昌革命政府黎元洪，表明山西民军之革命决心，以期相互支持，并自荐执笔。景梅九才名早已远扬，且对于当时形势自有一番感慨，一篇革命文告，文不加点，一挥而就：

宋卿大都督麾下：锡山本山右武夫，不识天下
大计；惟念炎黄神胄沦于异族，几三百年！古云：
“胡无百年之运！”，兹乃过倍，斯诚汉族男儿之奇
耻大辱，无面目以见天下者也！昔在俟岛，与二三
同志，酒酣耳热，论太平遗事，未尝不痛恨于曾、李